

# 文史資料選輯

第二十四輯

(內部發行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

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

# 文史資料選輯

第二十四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

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

中華書局出版

一九六一年十二月

## 編輯凡例

一、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資料，并推动撰写資料工作的开展。所选的資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經歷和見聞，有一定的史料价值，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，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，观点可能不尽正确，因此，本選輯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，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。

二、本選輯所选的資料，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，不拘体裁，只要有史料价值，均可选入。

三、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欢迎閱者提出补充和訂正。

四、本選輯对来稿可加以选录、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东的几起几落 .....   | 陈劭先 (1)   |
| 追随孙中山北伐回忆录 .....         | 龔师曾 (17)  |
| 孙中山北伐在桂林 .....           | 韓 鋒 (38)  |
| 孙中山北伐在韶关 .....           | 吳宗泰 (43)  |
| 护法軍政府海軍始末 .....          | 高子厚 (46)  |
|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紀略 .....       | 罗翼群 (51)  |
| 邓鏗之死 .....               | 李洁之 (54)  |
|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及分裂 .....      | 张藤村 (62)  |
| 陈炯明炮击总统府的前后 .....        | 林廷华 (77)  |
| 白馬会盟与滇桂粵联軍討伐陈炯明的战争 ..... | 莫 雄 (84)  |
| 一九一九年苏联派第一个代表到漳州 .....   | 陈其尤 (92)  |
| 无锡五个主要产业資本系統的形成与发展 ..... | 錢鐘汉 (98)  |
| 上海証券交易所概况 .....          | 許念暉 (155) |
| 上海“四·一二事变”目击記 .....      | 慕中岳 (174) |
| 阻击叶賀南征軍的战争 .....         | 黃紹竑 (179) |
| 阻截方志敏北上抗日先遣队战役的经过 .....  | 王耀武 (188) |
| 国防部保密局内幕 .....           | 沈 醉 (205) |
| 欧事研究会拾遺 .....            | 章士釗 (264) |

张静江事迹片断 ..... 何祖培 (277)

附载 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十三辑至第二十四

辑分类总目录 ..... (296)

#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东的几起几落

陈 劭 先

辛亥革命后，中山先生在广东的起落，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：（一）自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日中山先生在广州組織中华民国軍政府，至一九一八年六月一日被桂系軍閥压迫离粵为第一阶段；（二）自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政府，至陈炯明叛变，一九二二年八月九日离粵为第二阶段；（三）自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山先生在广州設立大元帥府，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为召开国民會議、解决国是离粵北上为第三阶段。在叙述中山先生这三次起落之前，我想先从改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談起，因为这与以后中山先生的起落有着前因后果的关系。但个人的所見所聞，难免零星片断，东鳞西爪，或仅可作补充的参考資料。

## 一 中华革命党成立的前后

一九一三年（民国二年）討袁失敗，我和彭素民等逃亡日本，謁見中山先生于东京头山滿的住宅（当时中山先生很穷，可以說一文“莫名，李烈鈞曾送五万元作活动費）。先生詢問湖口起义失敗情形并加慰勉后，不禁憤慨地說：“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，黨員不听号令，这个党我不要了。”因为在討袁前的全国二十二省中，国民党有

八个都督，仅赣、宁、皖、沪、閩、粵、湘、蜀的国民党军队，约有十二万人；在国会中国国民党系第一大党，各省议会也占优势，力量是相当大的。但是，为什么不到两个月就一败涂地呢？先生认为“非袁氏兵力之强，实同党人心之涣散。”先生继而强调指出：“我看袁世凯不出五年就要做皇帝，我们要赶快组织新党，起来革命，叫他做不成皇帝，如果等他做了皇帝，再去推翻他，那就更不容易了。”就在一九一三年冬着手筹备，次年七月八日，在东京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。可是中华革命党虽然建立了，而内部却由此引起了分裂。

首先，我想介绍一下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手续，这也是值得一记的小掌故。入党的人要立誓，誓约中有“附从孙先生”、“服从命令”和“如有贰心，甘受极刑”的几句话。誓约要自己亲笔照抄一份，在立誓人的名下，用右手中指打一墨印。然后站立在主盟人中山先生面前，宣读誓约，读毕将誓约交给主盟人，握手而退。有些人主张删去“附从孙先生”、“服从命令”两句，认为这会损害个人的自由。不少人反对打手模，认为有辱人格，并且说：“革命这么多年，出生入死，到今天还相信不过吗？”因而不肯入盟。不过，问题不是这么简单，内部分裂主要的有下列两个原因：

(一)同盟会的会员中，有多半是地主、官僚家庭的子弟，他们是激于民族意识和反清而革命，所以宣统退位，就认为革命成功了。到了国民党时代，又混进大批官僚政客，分子更为复杂。他们对于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和急进的革命主张，自然多不能接受，乃至大有抵触。因此，当年流传一种说法，“先生是理想家”，甚至称为“孙大炮”。简单一句话，这班人的思想跟不上中山先生的思想，已经落后于时代了。

(二)中山先生和黄兴，在政治问题上常常所见相左。例如：中

山先生本不愿意讓位于袁世凱，而黃興是主張退讓的。（汪精衛是主張讓位最力的人，他曾說：“先生如果不讓，人家要說先生爭地位權利呢！”）袁世凱暗殺宋教仁，中山先生主張立即興師問罪，黃興則堅持法律解決。中山先生要組織革命黨討袁，黃興又認為不可師出無名，等袁做了皇帝，再行討伐不遲。這樣，孫、黃就無法合作了，而跟黃興有關係和同一見解的人都不參加中華革命黨。這就形成了孫、黃分家，出現了所謂“孫文派”與“黃興派”。象李烈鈞、柏文蔚、陳炯明、譚人鳳等，在國內都是有軍隊和政治影響的，他們的離開，當然是一個損失。譬如，洪憲討袁之役，中華革命黨人曾在廣東、山東、江蘇等地起義，皆以力量小未能成事；而雲南起義，原國民黨軍人參加的雖也不少，但領導者卻為蔡鍔，在政治聲勢上中華革命軍比護國軍已略遜一籌了。

至于中華革命黨內部，情形也不見佳。

第一，據我所知，入盟的黨員不過七、八百人，其中比較多的是留日學生，其次為各省議員和中、上級軍官。他們多比較年青，雖然有些干劲，但組織觀念和紀律觀念很薄弱。最顯著的一個例子：一九一五年一月，袁世凱頒布了所謂“亂黨自首條例”，規定自首者不但不辦罪，還優予錄用。江西黨員魏調元（魏道明的父親）即偷回南昌自首，以出賣人格換到一個縣長。對於這個叛徒，並沒有開除他的黨籍。又有些黨員在日本無法維持生活，秘密地回到上海另謀出路，也就一走了事，所以有人說，“先生和洪秀全一樣的仁慈”。

第二，中華革命黨本部總務部長陳其美着重拉攏土匪流氓，好搞破壞暗殺，在上海還組織了一個幫會式的“十三兄弟”，記得有蔣介石、楊虎、韓恢（江北匪首）等，主持其事。因此對這路的“英雄好

汉”，总是有求必应，要錢有錢，要名义給名义，不問真假。江西人刘平，在上海穷得没办法，写信給东京本部，說他在江西可以召集几千人起义，就騙到了一个司令官銜和一笔款子。而上海交通站做党务工作的同志，却拿不到一文錢，連吃飯都成問題。大家推我去东京見中山先生，大胆陈述意見。先生回答說：“要知道，空喊革命有什么用？一百人中有九十九个騙我，只要一个人不騙我，就可以把革命空气激动起来。”不錯，暗杀上海鎮守使郑汝成，运动肇和兵艦起义，的确轟动了一时；但有不少同志总觉得，专靠这样的做法是难以成大事的，而老老实实做党务工作的党人倒无事可做，未免失却組織的意义。

第三，陈其美喜欢攬权，搞小宗派，对于党内的分裂，負有一定的責任。比如孙、黄之爭，他不但不尽力調解，反而推波助瀾。黄兴去美国后，他写信給黄兴，不是誠懇地劝黄兴回来，却加以严辞的詰責，同志們多認為过份，使孙、黄之間距离更远了。周震麟告我：“克强（黄兴的别号）自美国回上海后，我曾陪他拜会先生，又陪先生回看克强，两次都談得很好，不久，克强就病故了。”假如黄兴不死，孙、黄重新合作是有可能的。

总之，中华革命党的成立，并不如中山先生所期望的，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，成为健全有力的革命党，同时在使用枪杆子解决政治問題的时代，又沒有建立和掌握忠实可靠的武力，这样，以后中山先生的起落，就不得不决定于地方軍閥的拥护或反对了。

## 二 护法之役

一九一七年（民国六年），北京軍閥政府撕毀約法，解散国会，中山先生率南下海軍由沪去粵，并电邀国会議員赴粵开会，维护約

法。八月到粵國會議員九十一人，以不足法定人數，舉行非常會議，決議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；選舉中山先生為海陸軍大元帥，唐繼堯、陸榮廷為元帥。九月十日中山先生就大元帥職，這是先生在廣東第一次組織政府。

中山先生在七月十七日的歡迎會上發表他的政見演說：“中國共和垂六年，國民未有享過些共和幸福，非共和之罪也。執共和國政之人，以假共和之面孔，行真專制之手段也。故今之變亂，非帝制與民政之爭，非新舊潮流之爭，非南北意見之爭，實真共和與假共和之爭。”又於大元帥就職宣言中，明確宣布軍政府的職責為“戡定內亂，恢復約法”，因此國民黨稱為“護法之役”。

中山先生的護法，最初得西南各省的響應，南下海軍的支持，以及非常國會賦予法律上的權力，已造成了政治上的聲勢，形成可以有為的局面，但因內部存在不少嚴重的弱點，就終難免于失敗了。

就軍政府說，三個首腦人物中，兩個元帥唐繼堯、陸榮廷為西南六省最強的實力派，都始終不肯就職，同床異夢。不過唐繼堯和陸榮廷的態度却有所不同。唐繼堯為應付環境而護法，在這位封建西南王的心目中，並無所謂約法。他對中山先生既不反對，也不幫忙，袖手旁觀，以待時局的发展，再來下棋，正所謂貌合神離，待機觀變。而陸榮廷為鞏固兩廣地盤，早就在勾結北方。由於當時的段祺瑞內閣，採納了梁啟超的“對外宣而不戰，對內戰而不宣”的獻策，企圖吞併湖南及兩廣，發生了根本的利害衝突，因此他要反段，但只是反段個人，而不是反北京政府。由於護法與他反段的目標一致，就想利用護法這塊招牌，也僅止於此；而對於真正護法的軍政府就勢不兩立，因為它有礙於他的獨霸兩廣，不利於南北的合

流。所以当九月軍政府初成立时，陆荣廷就公开表示拥护北政府、反对軍政府的态度。他发出通电說：“方今国难初定，应以总统复职为先务之急，总统存在，自无另設政府之必要，元帅名义，尤滋疑議，易淆观听……实不敢輕为附和。”再說軍政府的六个部长，除陆军总长张开儒外，其余五个总长都延不就职，由次长代理部务。參謀总长李烈鈞（取消打手印改用图章后，已加入中华革命党）也以唐繼尧的关系，沒有到任。这样一个最高领导机关的軍政府，实际是一个空架子，只靠中山先生独力支撑，自难有所作为。

这里要附帶談一个故事。中山先生曾派軍政府秘書长章太炎为专使，前往云南敦劝唐繼尧来广州就元帅职，如果不能来，发个电报表示态度也可以。这位有名的怪人章太炎，特制了两面特大的紅旗，挑选两个年青力大的人扛着，作为先导，以壮行色，兼示隆重之意，一时传为美談。

就国会說，后来議員增加至二百余人，也可算是个政治力量。可是在議員中，論政治关系，忠于中山先生的人不多，属于政学系的也不多，中間派則占大多数。論分子，則人品混杂，只知道升官发财。因此，在陆荣廷的威逼利誘之下，在政学系楊永泰等拉攏煽动之中，就通过了改組軍政府案，即所謂改首領制为合議制，并选出七个政务总裁，这就是硬迫中山先生下野。

政学系的議員中，多原为国民党員，对于他們的投降軍閥，中山先生是非常痛恨的。然而曾几何时，自命为中山先生的“正統”的蒋介石，却引用楊永泰等为亲信知己，言听計从，成为蒋皇朝的四大支柱之一（一为軍事的黄埔，一为党务的CC，一为經濟的孔宋，一为政治的政学系）。这也只好說“物以类聚”、“沆瀣一气”而已。

就軍隊說，南下的軍艦十艘，總計一萬餘噸，這是中山先生一支可靠的武力（後來也變了）。而在廣東的陸軍，主要是陸榮廷的桂軍，其次為唐繼堯的滇軍，中山先生也是不能指揮調用的。雖然如此，護法討逆的旗幟，對於北京政府，畢竟是一種政治上的壓力，可以促使其內部發生變化。

中山先生計劃援閩，廣東省長朱慶瀾愿撥所轄親軍二十營（約四、五千人）相助，遂命陳炯明為援閩粵軍總司令，攻占閩西、南各縣。這支部隊後來擴充到二萬人。在那個時候，中山先生才算有一部分軍隊，也才有個立足之地。

就中華革命黨說，由於軍政府的經費極為困難（部長每月僅“例支”二十元），以及其他關係，到廣州的各省中華革命黨人，閑住旅館，無所事事。同志埋怨說：“我們是來革命的，結果在這裡看革命。”中山先生也只好安慰大家：“將來出師北伐，我要用你們的。”可以說，在廣東的黨和黨員是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。

在中山先生忍辱負重苦心支撐的殘局中，對外一籌莫展，而內部則相煎日急，真是咄咄逼人，毫無忌憚。一九一七年十二月，桂系陸榮廷等正式取消護法，通電主張南北議和。一九一八年一月，粵督莫榮新（桂系）擅捕大元帥府衛隊官兵數十人，誣為土匪槍決。唐繼堯、陸榮廷組織所謂“西南各省護法聯合會”，推出議和代表，與主張北伐的軍政府相對抗。二月，海軍總長程璧光被桂系暗殺。五月，莫榮新捕囚陸軍總長張開儒，非常國會通過改組軍政府案。至此，中山先生不得不辭大元帥職，六月一日離粵赴滬。先生在辭職電中指出：“顧吾國之大患，莫大於武人之爭雄，南與北如一丘之貉。雖號稱護法之省，亦莫肯俯首於法律及民意之下，……文于斯瘡口吮膏，以期各省之覺悟，蓋已力竭聲嘶，而莫由取信；……然文

之力，固已尽于是矣。”

### 三 驅逐桂系与陈炯明叛变

一九二〇年七月，中山先生命陈炯明率粵軍回粵，討伐桂系，桂軍战敗，收復广东。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山先生由沪抵广州，恢复軍政府。嗣以北方非法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，已丧失中央政府的資格，而法統不可一日中断，內政外交均需成立中央政府。于是一九二一年四月，国会非常會議決議，取消軍政府，成立中华民国政府，选举中山先生为大总统，五月五日就职，这是先生在广东第二次組織政府。六月，中山先生命粵、滇、黔、贛軍进攻陆荣廷的广西老巢，击潰全部桂軍，占領广西，两广遂成为革命政府的根据地。

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时，发表对内、对外宣言，提出了地方自治、和平統一、开放門戶和发展实业四大政治主张。对内宣称：“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，自定省宪，自选省长，中央分权于各省，各省分权于各县，庶几既分之民国，复以自治主义相結合，以归于統一。不必穷兵黩武，徒苦吾民。至于重要經濟事业，则由中央积极担任，发展实业，保护平民。对于外交，由中央負責，根本民意，講信修睦，維持国际平等地位，保障远东永久和平。”对外宣称：“文之第一职务，在統一民国各省各区置諸进步修明之政府管理之下，尊重列强依条約契約及成例正当取得之合法权利。全国最大之利源，悉予开发，抱門戶开放主义，欢迎外国之資本与技术。”十月，国会通过北伐案，“以竟护法全功”。

广东已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，拥有两广作根据地，軍隊除粵軍陈炯明一部分外，其余粵、滇、黔、贛軍都能服从指揮，并已与皖系（段祺瑞）奉系（张作霖）取得協議，南北夹击直系，北伐是具备了相

当条件的。

据我所知，自一九一九年以来，段祺瑞、张作霖曾先后派代表要求与中山先生合作討伐直系，这就是后来的所謂三角联盟。当时同志們認為，段为护法討逆的对象，张是“紅胡子”，直系卖国，皖系、奉系又何尝不卖国，所以对于联段、联张，不少人是怀疑的。中山先生解释：“如段能完全服从我之主张，我当引为同志。”又加以說明：“与段祺瑞接洽系政略之运用。”太家也就无意見了。

一九二一年十二月，中山先生在桂林設立大本营，准备第二年春出师湖南北伐。陈炯明即公开阻挠破坏，誘使湘督赵恆惕反对假道湖南，中山先生乃免陈的广东省长和粵軍总司令职，以示惩戒，但仍保留陈的陆軍部长，以促其悔悟；并改道江西，移大本营于韶关。一九二二年五月，直奉战争爆发，中山先生即下令进军江西。当北伐軍克贛州、进逼吉安时，陈炯明就发动武装叛变，于六月十六日开始围攻总统府，炮轟观音山，企图杀害中山先生。中山先生脱险登永丰艦，一面亲督海軍抗击叛軍，一面令北伐軍回粵平乱，坚持至八月九日，終以北伐軍回师失利，始离艦赴港轉沪。中山先生曾发表告同志書說：三十年来，“顧失敗之慘，未有甚于此役者。盖历次失敗，……則为失敗于敌人。此役……乃为十余年羽翼之陈炯明，且其阴毒险狠，凡敌人所不忍为者，皆为之而不惜。”

陈炯明为什么要背叛中山先生？主要的因为他是个道地的割据称雄的封建軍閥，根本不懂也不要什么革命。当他当上广东省长，只知道保全实力，巩固自己的地盘，因此一开始就借口“保境息民”阻挠北伐。其次，中山先生联段联张以倒曹（錕）、吳（佩孚），陈炯明却与直系早有勾搭，在曹、吳許他两广巡閱使的条件下，便甘心附逆，充当內奸。这說明陈炯明与中山先生在政治上已完全立于

敌对的地位。中山先生曾向陈炯明表示，把广东交给他，也不要他的队伍参加北伐，只责成他接济北伐军的餉械。中山先生还很坦率地告诉他：“我北伐胜利，不会再回广东；北伐失败，也无面目回广东。”然而这样沉痛的话，竟打不动见利忘义的陈炯明，终于变成革命的叛徒。

第二，陈炯明固然是坏东西，假使几个有关系的重要人物，能跟邓铿一样，顾全大局，看清利害，从中协和运用，事态或许可以缓和些。邓铿是陈炯明的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，他一向主张“陈应服从孙，孙应重任陈”，所以陈虽反对建立政府，出师北伐，不愿供应北伐军餉，经邓疏解，也就不说什么。一九二二年三月邓铿被人刺死，在陈炯明方面就没有了出力斡旋的人。而中山先生的左右，如胡汉民性情狭隘，和好揽权的陈炯明早就合不来，彼此成见很深。汪精卫表面上是奔走调停，暗地里却两面讨好。对胡、汪两个人，当年曾有这样的评语：“胡尖如针，汪薄如纸”，这就难望其发生和衷共济的调节作用。

第三，当时，有人认为陈炯明一定要叛变，力主先班师回粤，解决陈的军队，安定后方，再行北伐。但多数人认为，陈还不致如此，不要激成事变。主张最力的黄大伟（北伐军粤军第一路司令）且说：“如果陈竞存（陈炯明的别号）打先生一枪，我就还他一百枪。”最后中山先生决定：免去陈炯明的省长和总司令职，保留他的陆军部长的位置，以示告诫与安撫之意。这一着是失算的，因为只免去陈炯明的官职，对于他的部队又不动它，那就留下了以后的祸根。

第四，广州是广东省会所在地，是全省的富庶之区，而孙科得任广州市长（中山先生本来是不同意的，认为他刚从外国回来，没有政治经验），这对于把广东看作个人私产的省长陈炯明，当然是

很不滿意的。又孫科寵信吳鐵城，製造“太子派”，與“元老派”胡漢民對抗，這也影響了黨內的團結。

總之，大大小小的因素湊起來，陳炯明到了他緊急的利害關頭，就不顧一切犯上作亂了。

現在要補述我親歷的幾件事。

出征廣西陸榮廷時，中山先生派我任粵軍第一路司令部參議，大本營移韶關後，我又兼第一路軍韶關留守處主任。打下贛州的第二天，陳群（大本營秘書）告訴我，江西省長已內定謝遠涵了。我即和同鄉徐蘇中（總統府秘書）、歐陽莘（江西省議會副議長）、蕭炳章（參議員）、歐陽豪（江西游擊司令）見中山先生陳述意見：“謝遠涵是江西進步黨首領，湖口起義失敗，謝遠涵等即開列名單呈請袁世凱明令通緝，他是我們的政敵和仇人。現在派他去做省長，恐怕江西同志不會心服的。”中山先生回答說，“這些情形我不太清楚。不過我要告訴你們，謝遠涵已由謝良牧介紹參加中華革命黨，現在是我們的同志了。”中山先生又說：“發表你們哪一位當省長好不好？可是江西人都不知道你們。謝遠涵是老翰林，是前清御史，江西人知道他，北方軍閥也知道他，我要他做省長，會影響許多人的，會帶來不少人的。”我們覺得有道理，也就無話可說，後來謝遠涵果然有他的用處。

陳炯明發動叛變後，又派一支軍隊攻占韶關，大本營的高級官員逃到天主堂避難，我躲在一家裁縫鋪里。第二天我請老板出去看看情形，他回來說，旅長黎生出布告安民了。剛好我和黎生過去同過事，還有相當的交情，我請他幫忙給我一張回廣州的護照，就去天主堂拉了蔣作賓、呂超等搭軍車（客車已停）到沙面，轉船到香港。古應芬約我同去黃埔永豐艦見中山先生，報告前線軍事進展

的情况。中山先生說，現在即須調回北伐軍討賊，電報不通，已派人送信，不知能否送到，問我有什么办法传达他的命令。我說我有黎生的軍用护照，只有我自己跑一趟。中山先生很严肃地說：“那很好！告訴子蔭（黃大伟的別号），他曾說，如果陈炯明打我一枪，他要还陈炯明一百枪，于今陈炯明打了我 不止几百枪、几千枪，要他赶快回来平乱！”跟着写了一道手令交給我。中山先生又想起一件事說：“要謝省长（远涵）做点陈光远（江西督軍）的工作，相約彼此停战，我們不去打他，他也不要来打我們。”以便調回北伐軍。又交我致謝的一封亲笔信，当即面囑黃騷駕一小汽艇送我至沙面，我就又回到韶关，請黎生帮忙派几个兵送我通过叛軍的防地，先到赣州，把信交給謝远涵，說明他的任务，他答应“尽力而为之”。我又赶到遂川，会見黃大伟，传达中山先生的命令，黃即班师回粵。

各路北伐軍反攻韶关失敗了，这并非力量不够，合起来还有三万多人，实因已轉战桂、贛数月，弹尽粮絕不能再打了。八月三日在南雄召开軍事會議（胡汉民也参加了），中路李烈鈞率領的滇、贛軍主張經湖南退回广西，左翼黃大伟和右翼許崇智所部粵軍及福軍（李福林）主張向福建撤退，結果各行其是，分道揚鑣。

胡汉民随軍至会昌后，即赴福建延平，与皖系旅长王永泉商定合作驅逐閩督李厚基（李本屬皖系，段祺瑞下台后轉附直系）的条件，福建軍政交王主持，王助粵軍收复广东，并約定十月三日同时向福州进兵。十月十二日黃大伟、李福林两部首先进占福州。黃、李一面維持地方秩序，一面派我和福軍參謀长等接管財政、海关、盐务、烟酒等稅收机关，以济軍餉。接着发生省长人选的爭执，海軍及地方士紳推薩鎮冰，粵軍則推林森，最后决定林森为省长。

十月十八日中山先生电令改編入閩粵軍为东路討賊軍（福建